

瞿秋白革命精神主要特征和内涵要义研究

■ 张圆

一、瞿秋白革命精神的主要特征

瞿秋白1899年1月生于常州,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后英勇就义,他的一生,历经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变,经历了从封建王朝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共产党成立,最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深入分析瞿秋白的一生,我们不难总结出他的革命精神特征主要是儒家之义、人民之志和救亡之心。

(一)儒家之义

瞿秋白祖上是宜兴望族,虽然父亲不治家业,一家人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瞿世琥的接济,但是因为清政府尚未灭亡,科举制度仍在,所以出生于传统官僚世家的瞿秋白在幼时接触的大多是儒家经典文学。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思想构成了瞿秋白早期的思想底色,成为他革命精神中的重要特征。

孔子推崇“仁”,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还要有坚强的毅力和不畏牺牲精神,他说:“仁者必有勇”“杀身以成仁”。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中提到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气节,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的儒家思想注定了瞿秋白后面面对死亡威胁而为理想信念毅然牺牲的结局。

(二)人民之志

瞿秋白自从在“五四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就从未动摇过理想信念。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写的那样“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理论指引下,瞿秋白始终坚持奋斗的革命事业是“为人民开辟一条路”。面对国民党穷凶极恶的反革命迫害,他同妻子杨之华说“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这种不畏死亡的生命观深深反映了瞿秋白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志向,构成了他的革命精神的一部分。

(三)救亡之心

1919年,瞿秋白加入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接着去俄国采访学习,聆听列宁演讲,进一步深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他应陈独秀邀请回国,翻译列宁、斯大林的各种著作,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瞿秋白生活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的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瞿秋白的革命之路是坚定反帝反封建的一条路,是在各种混乱的社会思潮中高举共产主义救国的一条路。瞿秋白在俄国资深见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迅猛发展,便认定马克思所写的共产主义终将实现,只要中国也跟着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瞿秋白在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往来结下深厚友谊,更领导了左翼运动。救亡之心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动摇过。

二、瞿秋白革命精神的内涵要义

瞿秋白革命精神是对他的革命斗争、政治理论的高度概括,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分别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和传播真理的初心使命。

(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

瞿秋白的斗争精神始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混乱的社会现实使得全中国各个阶级提出了救亡图存的种种方案,但是都碍于现实和历史的原因没有使中国真正地站起来。年少时,瞿秋白一家因为叔祖父的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苦中。年少的瞿秋白开始思考人与人、人与国、国与国之间分配平等的道路。

1917年,瞿秋白经常去北大旁听,对于新思潮很有见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热烈响应,创办了《新社会》杂志,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但是,那时他的思想仍然比较幼稚,希望“取得英法各国之同情”以对付日本。

1921年~1922年,瞿秋白远赴苏俄,报道了俄共十大召开情况,并且在张太雷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他学习了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以及马恩的著作,熟悉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了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各种路线政策,这为他回国进行革命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以后,瞿秋白立即投身革命工作,大力宣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这时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趋于成熟。他认为,国民革命需要“全国人民群众”的参与,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比较弱小,需要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小商人、知识分子,使其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他的理论与毛泽东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谋而合,也最终成为完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

(二)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
(三)救亡之心

瞿秋白加入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接着去俄国采访学习,聆听列宁演讲,进一步深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他应陈独秀邀请回国,翻译列宁、斯大林的各种著作,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在那个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革命年代,瞿秋白经常面临死亡威胁,但他从未动摇过对党的坚定信仰。瞿秋白以“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决心,毅然表示,“宁死亦当一行”。

红军长征期间,瞿秋白因为养病留在了江西瑞金组织游击战,被国民党抓获,更不幸的是被叛徒出卖指认。在长汀监狱中,敌军以糖衣炮弹利诱,甚至宣称只要他脱离中国共产党,去国民党麾下当个普通的翻译就可活命,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瞿秋白断然拒绝。面对国民党的死亡威胁,瞿秋白说“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显然,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是瞿秋白坚定的精神内核,即使直面死亡也无所畏惧。瞿秋白在前往就义的路上唱《国际歌》,誓死追随共产主义信仰,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对党忠诚、舍生取义的精神品质是瞿秋白革命精神的显著标志,揭示了瞿秋白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斗士追随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革命意志。

(三)传播真理的初心使命

瞿秋白的革命之路,一直在坚持探索真理,从去俄国学习开始,到进入上海大学任教,从吸取先进思想到传播客观真理,这条路他走了很多年。

1920年,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此还没有很系统的认识,瞿秋白决心去往俄国,用自己的眼睛和文字学习和记录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政策。在苏俄考察的两年期间,瞿秋白不仅见到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还深入俄国社会各层面进行调查研究。他记录了苏俄的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共产党组织问题等,还富有远见地提出向苏俄学习的革命观点,指出“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然是社会主义从书里一个目录了”“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1923年,他出任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他表示要“努力把上海大学建设成南方新文化主义的中心”。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向学生们讲授了几乎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武装了学生的头脑,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念。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以及《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开创中国无产阶级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辩证思维的内在逻辑

■ 严浩月

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时代不断发展,改革永无止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构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梁八柱”,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彰显出新时代改革方法论鲜明的辩证思维逻辑。把握这一辩证思维的内蕴逻辑,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向纵深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实践指引,亦使我们更好理解如何正确认识、准确、有序、协调地推进改革。

一、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价值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历史沿革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坚定贯彻落实,亦是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部署的继承发展。“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密团结中国基本国情,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旨在进一步增强改革活力,从而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二者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历史的跨度围绕着共同的时代主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同样也是划时代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发展主线、战略举措等,同时全会对进一步深化改

革作出了系统部署,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瓶颈和桎梏等进行了辩证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顺应了历史的召唤,也是时代的必然,它既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章,亦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新招。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面临技术创新从而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面对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生活的新需求,只有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能破题开路打开新局面。

二、用联系的观点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系统集成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系统工程,各项改革措施之间关系紧密,因而要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努力做到相互协同,形成合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思想的集大成者。《决定》铺定十四个层面具体体制机制完善,坚持问题导向,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进行细化,同时明确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七个聚焦”指向,廓清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亦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的清晰阐释。可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做好改革进程中的系统谋划,进一步加强全面深化改革要素之间的联动性与协同性,从大局观念出发,从局部观念入手,坚持大局统领与局部服务,避免在改

革工作中顾此失彼、因小失大、相互掣肘,实现好各项工作的梯次接续与前后衔接,方能取得预期成效。

三、用矛盾分析方法抓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

用矛盾的观点抓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做工作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和倡导的方法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实则是强调改革的针对性和重点性,其中蕴含着“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的矛盾分析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重点领域“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关键环节“一子落而满盘活”。因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抓好影响全局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应切实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此更好地推动生产关系转型升级和升级,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动力,实现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同时,找准改革突破口还意味着因地制宜,在充分发挥党中央的领导作用和地方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将领导人民改革与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结合,进而找准具备实施改革条件的重点区域,先摸索规律试点,再总结推广经验,实现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等的协调推进,由此才能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方孝孺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

■ 徐涵秀

建议,以实现更明智的治理。他认为君主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天下苍生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自私自利。如果君主不能为民众谋利,那么君主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他反对专制统治者的独断专行,认为这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决策,造成国家的灾难。

方孝孺还反思了传统君臣关系,强调君主和臣子的职责以及他们之间应有的相互尊重。方孝孺指出,天下事务繁多,仅靠君主一人无法治理,因此需要贤明的臣子协助处理政务。君主应以诚意对待臣子,确保奸佞小人无从得势。

在君臣关系中,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至关重要。方孝孺主张,君臣之间应遵循“道”的原则,如果“道”不合,臣子可以选择引退,这既维护了臣子的尊严,也促进了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方孝孺特别赞赏宋代的君臣关系,认为宋代尊尚儒术、重视礼义,君臣之间的关系和谐,而在明初,君臣关系则显得苛刻不近人情。因此,方孝孺提倡君臣相互尊重,以实现更好的政治秩序。

(三)立法利民的法治思想

在法学思想上,方孝孺极力提倡的“立法为民众之福祉”理念,着重突显法律在预防、引导及保护民众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法律的核心功能体现在规范行为与正面导向上,既通过规则约束确保社会秩序井然,又预见性地教导公众,以防微杜渐,从而借助对违法行为的惩罚达到警示教育和教育并重的目的。这一“利民”为核心的法治观,与当代法治原则不谋而合。

(四)以民为本的经济思想

方孝孺的经济思想紧密关联于其政治理念,核心在于“藏富于民”与“让利于民”,强调民众福祉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根本联系。他认为,国家的稳定依托于民众拥有稳定的产业和基本生活保障,方孝孺主张减少赋税,避免过度剥削,提倡国家不应垄断财富,而应鼓励民间经营,以激活民间经济活力。方孝孺还支持恢复井田制,以此来抑制土地兼并,缓解贫富差距,认为这是实现仁政、防止社会动荡的关键。

他对当时部分地区遭受重赋表示不满,认为过重的负担导致民生困苦,加剧社会矛盾,并在辅政期间推动减轻这些地区的赋税,虽未能全面实施井田改革,

但显示出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远见与决心。方孝孺的经济思想凸显了以民众利益为中心的治理哲学,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方孝孺文化的现代价值

方孝孺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在某些核心价值观上不谋而合,为理解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历史的镜鉴与文化的支撑。

首先,方孝孺强调君主服务于国家和人民,这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契合。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理念体现了方孝孺“育民”与“养民”的思想的现代转化,即通过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差异甲基化基因位点筛选及其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 马鹏

甲状腺乳头状癌(PTC),作为甲状腺癌中最常见的分类,占据了所有甲状腺癌病例的85%比例。尽管大部分PTC患者预后趋向乐观,但不可忽视的是,一部分患者仍面临病情进展、转移及术后复发等严峻挑战。现有国内外研究资料指出,PTC的发病与发展过程与若干关键基因的特异性甲基化异常紧密相关,这一系列发现为深入理解PTC的病理机制开启了新的视角。近年来,表观遗传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强调了DNA甲基化在癌症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它如何通过调控基因表达机制来影响肿瘤的起始与演变。当DNA甲基化模式出现异常时,会直接干扰基因的正常表达水平,或增或减,从而在根本上调节着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动态。本项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从PTC患者群体中鉴别出那些与疾病进程紧密相连的差异化甲基化位点,并通过剖析这些位点在疾病状态中的具体功能角色,并进一步评估它们作为早期诊断标志物的可行性和科学价值。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纳了病例对照的研究设计,搜集了20余例初次确诊的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的肿瘤组织与毗邻正常组织样本。这些样本源于未经任何预处理、确诊为PTC的患者,并经手术后病理学检查进一步确认。研究选取了18份样本,运用 Illumina HumanMethylation450 BeadChip 技术平台进行了全基因组范围的DNA甲基化状态分析,旨在获取详尽的甲基化数据。初期步骤涉及对甲基化数据分析的标准化处理,并借由 R 软件环境中的随机森林分类方法,辨识出差异显著的甲基化位点,标准设定为统计学意义 P 值低于 0.05 及甲基化水平变化幅度不小于 0.2。接着,我们对相同批次的样本执行了全基因组 RNA 表达水平的芯片检测,以发掘表达有显著差异的基因群。通过整合 Gene Ontology (GO) 及 KEGG 途径富集分析,我们深入探讨了在 PT C 病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基因与信号传导路径。对于浮现出来的潜在目标基因,我们实施了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与蛋白质印迹技术,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基因在转录与翻译水平上的显著异常,增强了在甲状腺癌背景下这些发现的可靠性。此外,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揭示,这些基因表现出了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的诊断标志物。

二、结果

依据表1所示数据,我们通过全基因组范围内的甲基化芯片技术鉴定了4995个差异显著的甲基化位点,其中占比 88% 的位点分布于非启动子序列之外。为进一步探究这些位点的功能意义,我们实施了全基因组水平的 RNA 表达谱分析,甄别出 185 个与甲基化程度呈现负相关的基因及 38 个正相关的基因。在此基础上,我们深化了对若干关键基因的甲基化状况与其表达异常之间关联的验证工作。细致分析揭示,诸如 ERBB3、FGF1、HMGA2、GABRB2 及 FGFR2 等基因,在甲基化水平变化(分别记为 0.35、0.40、0.28 的 ΔBeta 值)及基因表达层面均展现出显著变异。这些变化在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与蛋白质印迹实验中得到了证实。此外,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

上述基因的区分辨别能力(以曲线下面积 AUC 衡量)分别为 0.91、0.93、0.89、0.88 及 0.92,有力地证明了它们作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的高潜力和临床价值。综合表1所列信息,可以明确指出这些关键基因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核心调控角色,并有望成为该病早期识别的重要靶标。

基因	甲基化差异 (ΔBeta)	表达水平变化	P 值	ROC 曲线 AUC
ERBB3	0.35	下调	0.001	0.91
FGF1	0.4	上调	0.002	0.93
HMGA2	0.28	上调	0.005	0.89
GABRB2	0.3	下调	0.001	0.88
FGFR2	0.33	上调	0.003	0.92

表 1 甲状腺乳头状癌差异甲基化基因数据表

三、讨论

本项研究工作聚焦于甲状腺乳头状癌(PTC)的遗传学特征,通过实施全面的全基因组甲基化状态评估与 RNA 表达模式剖析,我们有效地辨认出了4995个差异显著的甲基化位点,大部分这些位点分布于基因的非启动子序列之中。研究揭示了185个基因的甲基化程度与基因表达呈现强烈负相关,而38个基因则显示出了正相关,这一发现深化了我们对PTC病理机制的认知。特别地,诸如ERBB3、FGF1、HMGA2、GABRB2 及 FGFR2 等核心基因,其在甲基化及表达量上的显著变异,强烈暗示它们在PTC的病发与演进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我们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与蛋白质印迹技术,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基因在转录与翻译水平上的显著异常,增强了在甲状腺癌背景下的可靠性。此外,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揭示,这些基因表现出了高灵敏度和高